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人格论

第一卷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文艺界

人格论

第一卷

何向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格论/何向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9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7842-8

I. 人… II. 何… III. 人格心理学—研究 IV. 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333 号

-
- | | |
|-------|--|
| 书 名 | 人格论 |
| 著 者 | 何向阳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装帧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½ 插页 4 字数 388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7842-8 |
| 定 价 | 69.00 元 |
-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何向阳

1966年10月生，安徽安庆人。199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出版理论批评与学术随笔《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风》、《自巴颜喀拉》、《思远道》、《梦与马》、《夏娃备案》、《镜中水未逝》、《立虹为记》、《彼黍》等，主编《知识女性文丛》等。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2006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执大象，天下往。

——《道德经》

前 言

本书是论述人格的著作。

包括这部书在内,全书结构分为三卷。第一卷,人格与史。梳理人格理论以及相关人格思想的形成历史。第二卷,人格与文。以文学家的大量作品内外的人格显现作为例证,探讨人格在作家精神中的成长、发生及其作用,探索文学与人格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卷,人格与人。在历史与文学的纵横关系考察基础上,寻求社会文化意义的人格再生的起点。

本书的重点,是人格的文化历史考察分析与文学——人格理论的建构。

鉴于这一重点,第一卷,人格与史。在人格历史的思想长河中渐次展开,回顾中国思想史中与人格思想相关的对于人的“模式”的探索与论述,并同时梳理西方文化学、心理学发展史中对于人格心理学的奠基与建立起过重大推进作用的学术观点,两者文化的在人格探索与研究中的互补与推进,极大地丰富与扩展了人类关于自我的认识空间。当然,对于历史中人格理论和人格思想的叙述,是在研究与对比的视点展开的,比如对于儒、道、释、侠的关于“圣人”、“君子”诸多传统概念的分析,对于儒、侠、释等关于“人的内修”方面的同与异,以及“人的模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贯穿与分化,本卷力求在历史资料的爬梳中,加入新的见解与心得,以求完整地勾勒出人格于驳杂的历史中的那些边角或轮廓。这是这部长篇理论著作的起点。

第二卷,人格与文。研究文学与人格的内在关联。作为文艺心理学重要支脉的作家人格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深入、系统的探讨,作为文艺学中独特领域的文学人格研究同样亦受到长时间的冷落,基于对文艺学研究中形

式主义日益排挤、消解文学内在价值与意义的警惕,更基于对广泛存在、不断上涨的轻视精神的社会心理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奢华与精神贫乏不平衡的文化发展的省思,本卷试图建立一种更切入文学本质与人格核心的对作家与创作的综合研究,力求在一个新的思维层次、新的思想台基上体现作家人格心理研究与文学作品研究融合的意图。而考察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的对应关系所实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精神生态(文学现状)、精神生产(文学创作)与精神生成(作家人格、文学品格)关系的揭示,找到文学和人类精神的共同内质。

第二卷包括作家人格论与文学人格论两大部分。

作家人格论集中于作家人格的整体研究。围绕作家人格生成的历时性,阐述个体早期经验、人类早期经验、青春期、成人心理等因素对人格生成的影响、作用,以对作家的代型分析和对超越代型的人格主动性的强调,试图说明:社会文化是如何铸塑和造就作家的,而完型了的作家人格又是如何对社会发生间接作用的。围绕作家人格构成的共时性,阐述人格结构的三个层面及其关系,以对作家的群型分析和对超越群型的人格个体性的强调,揭示作家人格心理的整合特征,并在综合研究基础上,提出作家人格统一体的思想。经典作家的人格分类考察,为此提供了例证。

文学人格论集中论述文学的内在价值与作家人格的对应关系,提出文学人格层次论的观点。作家人格与文学品位的对应性在于,人格的高下与文学的品位有深在而神秘的联系。文学是作家动态结构的人格的瞬间显现,是他的精神自传。

针对于人格悖论现象,本书提出了新的研究观点,认为要克服以往人格悖论研究中的病理主义倾向,必须使研究建立在对人格的全面而非狭隘的理解上,由此,本书在对作家人格历史、文化、个性内涵和对变态人格、双重人格、分裂人格、自杀、疯狂等异化人格双重考察基础上,探讨了人格平衡力及能动人格的可能性,提出了在精神的层面而非单纯的现实层面、心理层面研究文学人格的思想,并引出精神人格统一体的概念,试图说明:作家在创作中是以整体人格投射于作品中的,而完成了的作品不仅补充和提高作家本人人格,而且直接参与人类精神的创造。人格心理理论与丰富驳杂的作家人格的大量例证,为此论述提供了背景。

第三卷,人格与人。从人类创造的历史与文学中回到人的起点,探索精神的个体价值及其对全整社会文化的促动作用。研究人格经由历史的创造与文学的书写,而在这种文化的纵横交织中如何产生一种新的图景——对于文化人格的再造,对于社会心理与民族精神的影响问题,这是一种对于人格的新质的研究。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描述与实证。它力图摆脱以往文艺心理学与心理文艺学的单向选择和由此带来的方法争执,而有意识地将尚属微观的人格研究纳入到一个宏阔的精神生态背景中去,以对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环境等外在条件的不同形式的介入,突破单纯心理研究的狭隘界限。当然,界限的突破只是前提,它的更远的理想达成是期望在对创作过程中的作家人格与作家创作外的人格发展的联系考察中,在对文学艺术与人类心灵成长的总体探索中,力图超越文艺心理学的界限而融入心理人类学学科中,将作家人格精神现象作为人类精神的一个样本与例证,力图“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深的秘密揭露出来”(恩格斯语),并力图找到人类心理的未来。

这也是这部著作所秉承的原则。

父亲曾说,一切文字,写到最后,只是两个字:人格。

我想这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凝缩。

帕斯卡尔说:我们不仅通过理性认识真理,而且通过心灵认识真理,我们知道一些第一原理,就是通过后者,理性必须把它的发展的基础放在得自心灵和本能的知识之上。

我想这一认识本就是我們不慎丢在文明里的人文学科的初衷。

这两句话,可看作是这部书写作本意的一种注释。

最后,我还想说,在一个社会定型了的思想格式和在一种不断生成的艺术感受的自由之间选择价值,人格就不单只是一个话题。本书与其说是叙述、提示一种思路或者思想,不如说在解说某种信仰;信仰不免浸透忧虑,要求理想,并且常常自相冲撞,所幸的是,它自始至终都未失掉一个人在多重自我裂变中对自己命定的道路探索的热情。

较之预言、结论与观念,这一部分更为著者所看重。

谨以此书敬献于我的父母。

献给人类历史中所有在自我精神搏战中最终取胜的人格英雄。

导 言

现时代已经很少有人如柏拉图那样,在一个不断消长的世界里去考证和探问人在固定历史和记录情感的意识后的那个原因了;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信仰到 21 世纪仍纠缠于作家笔头的“为何写作”的疑问,人在目的与原因间踟蹰几千年却从未找到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一个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接触任何与这一事实相关的文学题目时,都不免要反躬自问。

时时变化着的观念取代了思想,已成模式的东西控制着一代代人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标准,人们像沙滩一般吞吐海潮,却日渐削薄,于这种被动性的往复循环中已不复记得自己体内另种形态的神祇,和祖先。正如文明强大的外观景象,使人在如行星围绕恒星旋转的轨道上忘了自己还有自转的轨道和能量。

而我们的文化似乎一直在默许和强调着这种遗忘。

作家人格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学术界深入探讨的这种现象,与人格研究本身的命运暗合。无论文学批评还是心理学理论,人格概念都是作为某种理想被建设性地提出或肯定的,可能正因如此,人格研究在相当长时期仅限于概念论争和伦理阐释而未能获得深入、彻底甚至是进一步的论述;仿佛是对一个早已熟识的道理,人们以为知其然便是知其所以然而不予追究,许多问题被貌似明白地搁置了起来。人格与文学的命题正是其中之一。

在纷繁热闹的各类文学理论、艺术思潮风起云涌、一派风光的时候,被推上论坛议论争吵的总是形式或类形式的问题;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

现象学的次第风靡,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与耗散理论等“新三论”的自然学科及数学理论方法轮番成为人们谈论文学的轰动一时的工具和依据,在“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及其互补、熵定律、场定理等的渗透和移置里,有关人格的思考却总是不合时宜。方法论的进步不仅带来了丰富,也使我们容易因为迷乱而忘了道路的根本。方法只是其一,而我们文学所面对的已远不止此,还有方式,商业、传媒所构筑的另重迷惑也摇曳而来。

外象如此波乱纷繁,内里如何安寂宁馨?

人格理论被冷落的原因不仅在于前面提到的人类熟视无睹的弱点,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自身,在人格本身的内动外静的性质,它的神圣与永恒,它的未可言说的内心性与无限性,它的内在的恒定而坚决的定律,都使它无法赶上也不愿去赶任何骚动一时的喧哗。由此,在各类方法竞相以华丽的服饰装点自己而又沾沾自喜于包装的精美与特异时,在以这雅致、华美的装潢的热情行动去除掉本真与核心而使学问日益风化为硬韧坚固的龟甲时,在根本就已满足于对这硬壳的描摹以致在愈来愈精细的叙述刻画里愈来愈陶醉、沉溺时,确实找不到人格研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人格本身的不可讨论性,它大言无声的内质似已先验地决定了它必得被排除在时髦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理论在借鉴各式样科学材料构筑自己而宁肯摒弃意义也不向心理学借鉴人格理论缘由之一。基于这样的事实再看如下的话便不无道理:“关于外表事实的文件,我们已经太多,多得冬烘学者们永远无法凑拢成一个整体,多得足够让忙碌的知识普及者显出聪明有学问的样子,口沫横飞,讲上一辈子。但是,关于内在的事实——关于我们命运力量起源的中心所发生的事实——我们仍旧茫然无知。”^①

一方面,也许不曾有过一个时代,像现代,对自我意识感知得如此强烈,像现代这样频繁地谈论着人类的命运;一方面,知识、信息而非意义、价值的过剩与夸大,使得知识中主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真知灼见却为现代人所忽视。回首 20 世纪,显文学批评优于潜文化批评的事实——对于外在形式的兴趣超过对于内在精神的探索,给被称为处于批评的世纪的文学投下暗影,一方面,文学的平原上留下大量开采一半即已废弃的矿井,另一方面,批评的

^① [美]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探源》,第 21 页,彭镜禧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勘探又在另一块地面上饶有兴味地进行；批评的平面时代所造成的文学的滑行和对廉价掌声的沉溺，对未来世纪人的思维、思想及理解力都将发生重要影响。当然，对20世纪文学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批评，功不可没，然而就整体而言，20世纪的批评却不无遗憾。它对文学的热情里掺杂了太多的非批评成分，实用、操作的盛行，使它抽空了终极价值关怀而迷恋于文学之外的利益获得和陌生化、迷宫、悬念、叙述技巧诸种形式包装，批评自身的“浮出海面”和它对精神深度的回避，更使其宁肯轻巧地谈论浮在表层的技艺方法，而不惜消解和牺牲创造的主旨与意义，文学在批评的“加速度”里忙于转型，从而造成了文学深度信仰的流失，作家亦由此被引向骚动与喧嚣、瞬息或流程。而技术主义批评的思维，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主体。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文学的终极意义毕竟不是结构、符号，不是组合、分解方式，这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道理。问题是，似乎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自编的理论圈套，这个圈套是“为艺术而艺术”，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是“自我表现论”，是“零度写作”等形式主义，是“商业运作”的利益驱动，是“大众媒体”的沾沾自喜等为表征的机会主义，……不一而足，以致我们每前行一步都必得以剪断旧的圈索为前提，以后呢，一些新编的圈索在等待着我们步入，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进步，只不过是在一个大的方法的怪圈里做原地踏步，而许多我们引为自豪的学问其实不过是赖以依附的知识、似是而非的意见，而决非支撑生命向上的信念或真理。

所以，今天似乎到了该这样自问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还有多少取决于我们不被任何形态（哪怕是艺术本身）外力扭曲的内在人格？我们的知识追求还有多少来源于我们生命本真的要求？“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理论、“各领风骚三五月”的文学和“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批评，折射出时代文化思想的短命，折射出多元化的文化繁荣下“大跃进”式的浮躁，折射出先锋或人文精神口号都无法掩饰的知识界对大众化市场化的渴慕和知识者本人人格的孱弱与媚俗。是否，我们的文学、理论还将这样的斗室小戏引为骄傲？

中国一向有重人格的传统，暂不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圣人”、“真人”等模式对国民心态的影响与铸造，单文学上的“言志说”、“缘情说”、“童心说”及对文人人格、士大夫精神的强调便一直延续至今，可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一直不曾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这种现象使人惊异。耳濡目染的麻木？

暂且搁置的轻松?抑或逆反心态的构成?多年读书训练出的省思和警觉使我不能无动于衷。

对文学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直到“实验文学”、“新写实主义”的更迭交替的总结和“新历史”、“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文学的急不可耐的推出,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各潮兴起的方法投注的极大热情背后,确实深藏着某种对文学个体性的误读。方法的巨浪将我们拍打得措手不及,我们被湍流裹挟着由一个漩涡奔向另一个漩涡,我私下想,也许正是一种对方法的热衷挤走了我们本该关注的事情,也许正是一种对人格一知半解的氛围败坏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它不仅使得这项研究滞固不前,而且使得“人格”成为人人认识的词语同时,其深蕴的涵义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消解了,以致它今天仿佛成了连缀不起的断简残片。

还有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造成以上文化氛围的深层原因。即,人对自身怀有的不可名状的认知恐惧。在人们都已习惯于人格面具、社会角色的“文明”里,要使人卸下面具以自我的本真面目存在,其困难性可想而知。所以,人向外部世界延伸才干的能力扩张是否也是一种对向内部人性探索与求知的回避?是否,人的聪明机智已发展到,以对外的征服的精力来排斥与挤压掉对内关注的目光,以对外的胜利来占据和掩盖内心的混沌、迷茫与空虚?内视力的萎缩,中、西人类学家共同指出的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技术无限增长而人性进步缓慢的事实使我们对这种单向发展倍增怀疑。这种普遍存在的人格认知恐惧状况,使得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的铭言“认识你自己”在千百年后——科技已发展到卫星、火箭的21世纪的今天——仍不失为对人类自己的一句警示。

人们将期待转向文学,希望求助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而一贯以能指导人生和影响人生而自豪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却津津乐道于各种方法试剂的配备与试验,以同样埋头苦干的外在的劳碌来掩饰它实质上的对意义的回避,用冰冷的形式框架去衡量文学生命的血肉,从而在借助各种科学作为研究方案的过程中变得生涩、笨拙、斑驳陆离,以致最终忘记了它谈论文学的最初用意。

而人格研究,在中国,一直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股潜流,亦是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一股暗流,古代伦理价值基础上的人格思想在近现代仍然保持着它初

期的淳朴,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人格理论一直存在着同语重复的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学术对于国外先进思想的大量译介,使人格理论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但是,人格理论的发展仍局限于借鉴,而且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成果国外研究的系统介绍与翻译本身,在变动不居的思潮引进中,并未有一以贯之的研究跟进,这种只是学科的移用方法的引进造成了另一种停滞,尽管在临近21世纪的几年里,尚有一些谈人格的零散文章,却也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研究风尚。种种情状说明了人格本身界定的传统逻辑上的暧昧晦暗,和转型期尚未定型的整体文化观念的粗糙、模棱。太多表象的问题需要澄清,在一个跨越百年的学科融汇的交叉地带,必然有某些芜草不及修整,也必然有某些领域仍属空地。1985年前后各种文化思潮由鼎盛相继走向冷寂,文坛喧闹已渐平息的时候,有关人格的探索才有了一个悄悄的开始。而这开始,在稳健的同时又是怎样的迟疑和小翼翼。总之,人格探索在传统人格理论滞塞的背景下,引进了西方心理学的人格理论,可是却未能找到两种文化的衔接部,地气没有接上,血脉未能沟通,人格理论仍然只是各说各的,油水不溶。这是人格心理学的借鉴在当代中国人文学科中水分很快蒸发的重要原因。

在追溯了人格研究不大走运的原因之后,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人格研究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不是西方心理学译著,也不是文学的外观现象,而应以它们作为两个参照系,从而将视线焦点集中于人,即作家身上。

人,是一切人文学科的起源。人,也一直是人文学科人文思想的肇端。同样,人也应该成为以人为主体的研究的前提。

那么,作为文学人格研究的一个参照系——心理学的发展是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呢?从史的角度看,心理学本应更关注人的价值问题,而长期以来,却流于一般概念、规范与界定技术的研讨,从而将有关价值的探索让位给了哲学、伦理学,而同样陷于只讲概念与规范的哲学与伦理学是否有意承担对一个时代精神状况反映与建设的责任呢?如果连哲学、伦理学两项最能代表人类创造、衡量人自身素质的学科都遭受到价值失落的颠覆,年轻的心理学便不能再犹豫不决和袖手旁观了。的确,我们需要一种向上的心理学,在长期对病态、变态研究基础上,重建人类心理健康的价值。这层意义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诞生不无道理;如果只研究、关注病态、变态的人,确实

不仅会滋长研究者本人的病态,也会使人类自身对自己的希望与前程愈感渺茫以致无望,更会使文学向低俗方面发展从而丧失掉文学应有的激励作用、净化作用和向上的审美需要。要使文学担负起提高人类素质的使命,首先也应从探讨人、人格开始。心理学与文学在这一点上日趋一致,它们的终极关心是共同的,那就是: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前景、成长与发展如何?人类如何完善自我?而最贴近这种关注的、在以往传统心理学中长期遭受冷落与忽视的人格理论,于20世纪中后期成为心理学乃至世界人文学科讨论的热点这一事实本身,就已反映出人的问题已成为了人自身回避不开的问题,同时也是人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没有人这一协调一致的概念,就不能说明各种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记忆影响知觉,愿望影响意义,意义决定行动,行动又形成记忆,如此等等,以致无限。这不断的相互渗透发生在某种界限以内,这界限即我们所说的人”^①。奥尔波特的这番话也在表明,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人。

而对人的关注早就被尊为文学的本质。这是我们的另一参照系。

无论认识、审美还是艺术都不能离开意义,而意义只有在人的范畴与层次上才可能存在并被称为意义。所以,我们的人格研究决不是一种还原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悖于还原的世界观,其具体研究是逆向的,其目的指向是向前的。它的全部努力在于防止精神“赤字”局面的出现,从作家精神生成中寻找提升人格的途径。在文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学人格心理研究中实现其对创作精神描述的心理人格研究(即表层现象的深层研究)的同时,文学——人格研究的最高意义就是在任何时刻不忘人之为人的自由与尊严,这种内在的自我确立精神也同样是我们的时代和文化所需要和应该具备的。

在这一背景下,力求体现将作家人格心理研究与作品研究融合起来的意图,力图在一个新的思维层次、新的思想台基上克服陈见与盲目,而且一种共同的目的——人的发展——已为文学与心理学提供了共同研究的交叉、叠印领地,向往能够通过写作实现。在以往横向的面的研究的成就上,我们已具备了纵向的点的研究的条件;在整合意识基础上,本书所要强调的是同样重要的剥离意识,并在这种双向思维运动中考察作家人格,亦即在精神生产(文

^① Allport, C. W.,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nston Inc., p. 553. 转引自林方《心灵的困惑与自救——心理学的价值理论》,第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学创作)与精神生态(文学现状)诸现象中寻找一种共同的质:精神生成(作家人格),从而进一步探索精神生成的个体价值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作家研究一直是文艺心理学的核心,而作家人格研究则是核心的核心。作家人格研究是在对作家心理机制与精神素质的综合研究基础上力图找到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品格内部联系的一种研究。本书第二卷的主体部分内容所尝试的正是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以作家人格为核,辐射到文艺现象的三大块:社会、作家、作品。在这种联系中,本书第二卷将要完成的工作是:社会是如何铸塑和造就作家人格的,完型了的作家人格对社会又是怎样发生间接作用的;作家在创作中是如何将人格投射于作品的,而完成了的作品又是怎样不仅补充和提高作家本人人格,而且直接参与人类精神创造的。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秘的东西从内心深处揭示出来”^①,更是本书贯穿始终的动力。

为此,下面的话对于理解这部著作的诞生是有益的:

我相信,对于摆在面前被我们不停阅读,亦使我们不断受着鼓舞乃至塑造、重铸着我们品格、性格的文学作品来讲,藏在它背后的或说是凝结于其中的人格正是我们希望透过创作表象而洞穿的东西。

我相信,作家所创造出的作品正是他本人的全部精神,而人格^②便是这精神的核心。

我相信,只有抓住文学作品深层隐藏着的人格实质,“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才会在“文学是写人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文艺是写给人看的”(文艺美学研究)、“文学是人写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三层意义之上有其更深层的内涵——文学是由带有人类共性与作家个性的人写的(作家人格研究),而且,只有人格高尚的作家才能创造出高尚的文学。

这也是这种研究的魅力所在。它在更高的意义上超越了心理科学与文学,而指向一种更普遍的人的成长与价值实现,指向人内在的智慧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不受任何学科限制的,是超越时代、指向未来的。这是本书第三卷将完成的部分,作家人格——文学人物人格——国民文化人格的链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3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② 此处所讲“人格”是精神综合意义的人格,偏重于心理意义,而非单具伦理的意味。